



培根散文精选

 海天出版社（中国·深圳）

世界散文八大家

柳鸣九 主编



Francis Bacon

培根

散文精选

肖明翰 编选



海天出版社（中国·深圳）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培根散文精选 / 柳鸣九主编; 肖明翰编选. —深圳:
海天出版社, 2014. 5
(世界散文八大家)
ISBN 978-7-5507-0910-2

I. ①培… II. ①柳… ②肖… III. ①散文集—英国—中世纪
IV. ①I561.6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3) 第277978号

培根散文精选

PEIGEN SANWEN JINGXUAN

出品人 陈新亮
责任编辑 梁 萍 林星海
责任技编 蔡梅琴
装帧设计



出版发行 海天出版社
地 址 深圳市彩田南路海天大厦 (518033)
网 址 www.htph.com.cn
订购电话 0755-83460137 (批发) 83460397 (邮购)
印 刷 深圳市华信图文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787mm × 1092mm 1/16
印 张 17
字 数 250千
版 次 2014年5月第1版
印 次 2014年5月第1次
印 数 1—4000册
定 价 30.00元



海天版图书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海天版图书凡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总序：散文的疆界在哪里

◎ 柳鸣九

“世界散文八大家”丛书是这些年来已经出版过的多种世界散文选中，较为别具一格、多少另有新意的一种。其新意就在于编选成集的角度不像过去一些选本那样是以国别分集，而是以作家个人成集。其作家总数，则不多不少，恰好是八位。显而易见，这是典型的中国传统数字文化：八仙过海、唐宋散文八大家、武学八大金刚，甚至烹调术中的八珍丸子……都是古已有之。正是出于这种沿用传统的意识，深圳海天出版社前几年请季羨林先生主编了一套“当代中国散文八大家”丛书，出版后颇获成功，现在余兴未尽，又约请我主编这套“世界散文八大家”丛书，以期构成他们散文出版中的“双璧”。这便是这一套书的来由。

世界散文的发展有其客观的历史，各国的散文文库也有其客观的存量，都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与好恶为转移。如何选？选多少？是取其六，还是取其八？都不是一个绝对真理问题。而选这一些，不选那一些，也是一个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问题。关于本套书所选的这八位，我只能说是根据我个人对世界散文历史的认知，选取了我心目中较有影响、较有广泛声誉者。而在思想艺术风格上，则选取了较大程度上投合更广泛读者的口味者——也就是说，力求避免过于保守或过于前卫。这种选法实不敢期望能获得所有行家知者一致赞同，至于这

八位散文家的思想价值与艺术风格，已分别由各卷的编选者加以论述，就用不着我再赘述了。

倒是有一个问题，这里必须着重加以说明，那就是：散文的国土有多大？它的疆界在哪里？它的边缘如何划定？因为，凡读论散文者，凡编选散文集者，都不能回避这样一个地域学问题。

文艺理论家、批评家对散文如何下定义，如何作界说，文艺学讲义、博士学位论文对散文如何进行辨析，这只是学术象牙塔里的事、云端里的事，一般的阅读者往往是不大理睬的。我们知道，在社会现实生活里，经常流通、为人常见的那些文化成分，对于人们文化观念、文化模式的形成，总是起着至关重要作用的，至少也起着约定俗成的作用。正因为如此，不难理解，一般的阅读者的散文理念、散文模式，往往不是来自教科书与学位论文，而正是来自他们常见到的、常读到的那些散文作品。

在中国能识字读书的人群中，出身于书香之族、家学源远流长、自幼饱读经史的“上帝的选民”，乃极少数，多数人所受的教育都是“大众型”的。根据我自己以及我周围人群的经历，在一般人所受到的那种“大众型”的启蒙教育与中小学教育中，《唐诗三百首》与《古文观止》是两位重要的老师。而《古文观止》对这“大众型”的智识层在形成民族传统散文的概念上，正起了某种准绳式的规范作用。特别是其中像《陈情表》、《归去来兮辞》、《滕王阁序》、《陋室铭》、《进学解》、《岳阳楼记》、《醉翁亭记》、《赤壁赋》等这样一些为青年学子广为传诵的名篇，更成为人们心目中的散文典范。

“五四”以后，散文大为发展，于是在人们的文化生活里，又多了一些传诵的名篇：《背影》、《荷塘月色》、《寄小读者》、《我所知道的康桥》等等。中国散文中这个一脉相承的传统，实际上代表了整整一个族类，其特点是抒写的内容不超出自我的半径之内，或为自我的见闻与感受，或为自我的辨析与哲理。不外园林山水、花鸟鱼虫的景观，修身养性的道理，经历行止、身边琐事的感言。形式上则单独成篇，文章结构内敛凝聚，布局谋篇甚为讲究，遣词造句力求精练，通篇追求自我的性灵、雅美的意趣、闲适从容的情致。所以，只要一讲起散文，人们首先就想到了这个族类，就把这个族类当作散文的本

体、散文的“王室”。

这就是一般人的散文观的由来，也是一般人心目里的散文范畴、散文领地。这种散文范畴观可以说是在历史过程中自然形成的，因为人们是出于愉悦的需要而向这种散文倾斜的——要知道愉悦的需要毕竟是芸芸众生在文学阅读中最原始自然，而又合情合理的需要。

现在，在散文的国土问题上，让我们把亚里士多德、文艺学讲义、辞源与博士学位论文放在一边，从简单的文学事实出发吧。

对于文学的发展来说，书面文字的产生无疑是至关重要的，文学史往往都把文学的起源上溯到书面文字的出现。文字产生之后，其用于人类各种活动中不外记事、论说与歌咏等各种形式，并由此自然而然地讲究到文字上的修辞与技巧。如果说文字的产生以及修辞学的运用，离诗歌、小说、戏剧还很远的话，那么它们离散文就只有一步之遥了。不要以为直接用于人类的祭祀鬼神、公文告示、记事备忘、奏启呈文等等各种实际活动的书面文字，是绝对与散文无关的——好像虫蛆怎么也变不成蝴蝶——恰巧相反，直接为这些实际活动服务的书面文字，只要说得头头是道、明晓透辟、情词并茂，就很容易可以上升到散文的范畴：辞职书写得恳切感人，便有了李密的《陈情表》；与朋友闹纠纷讲理头头是道，便有了嵇康的《与山巨源绝交书》；祭鬼神、慰亡灵之作写得悲怆苍凉，便有了《吊古战场文》。诸葛亮的《出师表》其实就是打上去的一份政策分析报告，骆宾王的《代徐敬业传檄天下文》便是一张写得很讲究的公文告示，而王安石的《答司马谏议书》也不过是写得义正词严的“党争”中短兵相接的争辩。而这些文章，都已经成为了中国散文中公认的精品。

众所周知，人类的社会实践活动早于文学活动，人类社会实践活动的需要也远远大于文学活动的需要，而各种社会实践活动中的实际文字语言，正是散文可能滋生也比较容易滋生的温床。如果笔者不是在歪着嘴巴说理的话，那么就可以下结论说，散文艺术是文学中最古老的艺术，它的资格比小说艺术与戏剧艺术都要早；而散文又是文学世界里疆界最大的王国，它的幅员比小说与戏剧要大得多。

其实，在文学世界的版图上，除了诗的王国外，剩下的就是散文的莽原了。戏剧与小说这两个王国，也基本上是在散文的莽原上建立

起来的，而且是后来的事。没有散文做基础，小说与戏剧这两个王国的独立与发展是不可想象的。即使在小说与戏剧有了高度发展之后，我们仍经常在它们的殿堂里俯首可见由散文所构成的殿堂地面——雨果的《悲惨世界》中滑铁卢一章，实际上是法国人大制作的惨烈悲凉的《吊古战场文》；博马舍的名剧《费加罗的婚礼》中主人公那段在剧本里举足轻重的著名独白，本身就是可独立成篇的绝妙的散文自述；契诃夫的独幕剧《论烟草有害》，其实就是一篇幽默讽刺散文；夏多布里昂的小说《阿达拉》的“序幕”早已被公认为一篇写景的上好佳品。

从人类社会实践活动的需要与可能来看，产生散文的层面与途径远比诗歌、小说、戏剧来得广泛；同样，从写作者的条件与可能来看，产生散文的层面与途径也比诗歌、小说、戏剧来得广泛。因为不论是诗歌、小说、戏剧的创作，都需要一定的专门艺术技巧，而散文的写作则相对要简单一些。不论是出于政治、经济、宗教、社会人际关系及交往的需要，还是出于学术文化与哲学思辨的热情；不论是由于现实景观与见闻的引发，还是个人心绪与性灵的萌动，只要具有优良的语言修养以及谋篇布局的技艺，有意识地追求一定的艺术意境，或大则成书，或小则成篇。即使从简营造，短小精悍，皆可成为散文佳品。

因此，在文学发展的过程中，散文的创作量往往实际上要大于诗歌、小说与戏剧的创作量。由于性质与内容的不同，它又有着哲理散文、历史散文、记事散文、描述散文、抒情散文、政论散文、文化散文以及交往应酬散文等等各种门类，所有这些构成了一个幅员辽阔的散文帝国。如果只承认闲适性的散文才是散文，岂不就把其他种类数量庞大的散文拒于法门之外，让它们成为野鬼孤魂？如果只把散文的领域局限于闲适性的散文，那岂不是把散文王国的大片领土生割出去，弃之不顾？如果不把它们称为散文，又称为什么呢？照笔者的理解，那些广为传闻的闲适美文精品，可说是构成了散文王国的紫禁城，然而，在紫禁城之外，还有更大的京畿，还有辽阔的外省边陲。鲁迅在《南腔北调集》的《小品文的危机》一文里，就把这种闲适性的散文称为“散文小品”，甚至称为“小摆设”，显然就没有把它当做

一个“泱泱大国”来看待。

本着以上的理解来规划这套散文选集，我们有意识地拓宽了选题的范围，将一些历史论著、哲理著作、政论演说、文艺评论、回忆录，以及日记书信中有文采、有一定形象性、堪称经典散文的佳篇选入。也许，在这里，散文的边界有时会显得有点模糊，但总比割舍了一大片领土要强。这就是我们的基本立意。

文化积累是一项社会性的、需要大家添砖加瓦的工程，对世界散文的研究、梳理、编选、译介的工作也是这样，但愿各种选本相得益彰，各自做出自己的贡献。如果读者认为我们这套选集也添加了一些自己的东西，我们将感到莫大的欣慰。

选本序：划时代开拓者，警句式散文大师

◎ 肖明翰

弗兰西斯·培根（Francis Bacon，1561～1626）是英国杰出的哲学家、科学家、政治家和文学家，对近现代西方哲学和科学思想产生了重大影响，是一个划时代的人物，被马克思称赞为“英国唯物主义和整个现代实验科学的真正始祖”。

培根于1561年1月22日出生在伦敦一个显赫家庭。父亲尼科拉斯·培根是伊丽莎白女王的掌玺大臣；母亲为继室，是女王朝中权臣伯莱公爵的妻妹。她身出名门，乃英国重要清教思想家和英王爱德华六世老师安东尼·库克男爵幼女，受过良好教育，很有才识，弗兰西斯为其次子。

培根自幼聪慧过人，深受时人称赞，连女王也戏称他为“小掌玺大臣”。他12岁同哥哥安东尼一道进剑桥大学三一学院，其导师约翰·惠特格夫特（John Whitgift）博士学识渊博，后晋升为坎特伯雷大主教。在剑桥期间，培根开始质疑亚里士多德哲学和经院哲学，特别是那种以三段论为基础的思维方式和研究方法，认为这种方法“无用”（unfruitful）。

1575年12月，培根离开剑桥，按父亲设计，于次年6月进伦敦格雷法学院（Gray's Inn），为仕途做准备。然而，正式学习尚未开始，他又被安排随英国驻法大使去了巴黎。在法期间，他游历广泛，

目睹了天主教会和改革派之间的残酷斗争，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他未来对待英格兰的政治和宗教冲突的态度。

1579年，父亲去世，他回国奔丧，不久回格雷法学院学习法律。此后，他一生主要从事司法工作，于1582年成为律师，1586年被任命为法官。父亲的突然去世实际上使他失去了未来在仕途上发展的靠山，也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他的命运。他由于排行第八（他父亲与前妻另有三儿三女），为幼子，几无继承权，加之他生性慷慨又爱讲排场，因此经济往往拮据，甚至多次因欠债而遭拘捕。

1581年，他作为康沃尔波西尼选区代表入议会下院，开始涉足政坛。很快以其才干、学识和辩才脱颖而出。他任议会议员约40年之久，但其仕途并不顺利。他虽四处奔走，多方托人，终伊丽莎白女王一朝，也未获任何重要职位。

由于无法从姨父伯莱公爵等权臣处获得支持，培根转而依附艾塞克斯伯爵。伯爵刚二十出头，意气风发，深得女王宠信。伯爵十分赏识培根的学识和才干，积极为他谋求总检察长和副总检察长职位，但由于培根曾在国会带头反对女王为西班牙战争筹款而得罪过女王，所以都未能成功。作为补偿，伯爵竟将自己的私产特威肯汉姆园慨然相赠。1601年，艾塞克斯伯爵谋反失败，女王命培根参与审判，他十分尽责，因此背上卖友求荣的骂名。为此，他在1604年发文为自己辩护，但这个污点未能完全洗刷。

1603年，伊丽莎白女王去世，苏格兰国王詹姆斯六世继位为英格兰国王，即詹姆斯一世。培根命运终获改变，其兄安东尼生前是詹姆斯的忠诚支持者是重要原因。培根给詹姆斯写信，提醒国王“我那好哥哥对陛下”的“无限忠诚”。詹姆斯继位当年，培根即与300人一道受封为骑士，不过因人数太多，他略感失落。此后，他的仕途颇为顺畅，第二年就成为国王顾问。1607年，他被任命为副检察长，6年后升任总检察长。1616年，他在白金汉公爵的支持下，被任命为枢密大臣。1617年3月，他被任命为掌玺大臣，在父亲去世38年后，终于重获父亲当年的职位。为此，他身着紫色袍服，凯旋般前往英国权力中心西敏寺。1618年1月4日，培根成为大法官。7月12日，他被授予维鲁拉姆男爵（Baron Verulam）爵位，踏入贵族阶层，并进入国会上院。

那些年，培根可谓春风得意。1621年1月22日，培根迎来六十大寿，广受朋友庆贺，好友大诗人和剧作家本·琼生也前来献诗祝寿。5天后，他晋升奥尔本斯子爵（Viscount St. Albans），到达仕途顶峰。然而命运似乎与他开了个玩笑：就在他志得意满之时，危险也正悄悄临近。他的对手在暗中收集材料，准备一举置他于死地。实际上，他们真正的目标是白金汉公爵，然而公爵势力太大，一时难以撼动，因此他们把培根抛出作为替罪羊，试图起到敲山震虎的作用。

3月14日，在新召开的议会中，有人在下院发难。3天后，案件移交贵族院，培根正生病卧床在家，但对指控已有风闻。24日，他正式收到所受指控的书面材料。对他的主要指控是贪赃枉法：作为法官，他收了受审人送的新年贺礼和其他人一些钱财。一开始，培根并不太在意，因为这样的送礼当时十分普遍，而且他也不是私下收受。但对他的指控不断加码，收礼变成受贿，他终于成为160年来第一个在国会受弹劾的重要官员。30日，他承认受贿，但不承认枉法。5月1日，他被剥夺掌玺大臣之职；3日，判决下达：处4万英镑罚金，监禁于伦敦塔，从此不得担任公职，不得进入议会，并不准涉足靠近王宫12英里的区域。值得一提的是，重要人物进出伦敦塔在当时是常事，以致议员们和官员将其戏称为“我们的监狱”。判决下达时培根尚在病中，所以直到5月底，他才从泰晤士河上用船押送至伦敦塔，使他避免了穿街过巷必遭围观的羞辱。几天后被国王释放，罚金也被取消，但他的仕途也从此终结。

培根对整个案件的评价是：“我是50年来英格兰最公正的法官，但这是200年来议会最公正的指控。”同他许多著名散文一样，这一说法意义相当含混，但不无道理。一方面，他的确收受贿赂，但他也的确没有在审案中徇私枉法。据学者们研究，由于当时王室政府经费困难，收受礼物或贿赂在当时极为普遍，以致成为许多官员的重要甚至主要收入。连詹姆斯国王也承认，如果“惩治所有受贿之人，我很快将不剩一个臣民”。塞辛指出：“现代学者对这个案件进行的一项全面而彻底的研究表明，培根相对来说是无辜的。”实际上，培根是当时民众和王室以及各种政治力量之间剧烈斗争的牺牲品。培根在给国王的信中言辞恳切地指出了这一点，并预见到更大危机的来临。不出他所料，这一斗争后

来演化成 20 多年后把查理一世送上断头台的革命运动。

不幸中的大幸是，培根现在终于能全身心投入他所喜爱的研究和学术活动。自青年时代起，培根就一直过着学者和官员的双重生活，而且对二者都十分热衷。他曾多年设法跻身官场，后又为加官晋爵竭尽全力，但同时他孜孜不倦地从事学术研究和思想探索。他在两方面都成就斐然；但在内心深处，他更感到自己本质上是一个学者、一个思想家，更适合学术研究和思想探索。他一生中多次表达了这种愿望。比如早在 1597 年初版《散文集》的献词中，他对身体羸弱的哥哥安东尼说：“有时我真希望您的病痛能转移到我身上，那样的话，女王陛下就会有您这么一位精力充沛而富有才干的人为之服务，而我也有理由潜心于我最适宜从事的思考和研究。”多年后，他又说，“就我本性而言，我知道我更适合手拿一本书，而非扮演一个角色。”但他无法抵制功名利禄和在政治上一展抱负的诱惑，他因此常感矛盾和痛苦。在受弹劾后写的祷告词里，他忏悔将上帝赋予的“才智”“误用在我最不宜之事”，“所以我可以真诚地说，在我人生旅途上，我的灵魂是一个陌路人。”

尽管不断受世俗事物和官场冲突干扰，培根十分勤奋，笔耕不止，著述丰富。在丢官之前他已写出或出版了不少文章著作，其中特别重要的有《散文集》第一、二版（1597 年、1612 年）、《学术之进步》（1605 年）、《古人的智慧》（1609 年）、《新工具论》（1620 年）等。其中，《学术之进步》和《新工具论》是他未能完成的宏伟巨著《大复兴》的第一和第二部，是他的代表作。爱默生曾将《学术之进步》赞誉为英格兰“民族赖以显示其智慧的主要书籍之一”。

1621 年，受弹劾离开官场后，培根在生命中最后 5 年全身心投入他热爱的学术研究，为后世做出比他在高位上远为宝贵的贡献。第二年，他出版历史著作《亨利七世》和自然史著作《风史》。1623 年，他出版《生死史》（此书与《风史》一道是他计划中的 6 部自然史著作中的两部）和大为扩展的拉丁文版《学术之进步》。1625 年出版《散文集》第三版。这期间，他还一直忙于撰写另外几部自然史、乌托邦式科幻哲学小说《新亚特兰蒂斯》和其他一些著作。

1626 年 3 月底一个风雪交加的日子，在途经伦敦北郊时，这位一生提倡科学实验的思想家突发灵感，要试验冷冻防腐，于是不顾高

龄体弱，下车向一位农妇买来一只鸡，将其剖开，用雪塞满。他不幸因此着凉，被送到附近一座农庄，于4月9日在该处逝世。他因试验而去世，象征性地表明，他将一生献给了他极力提倡的科学实验。

培根生活在欧洲社会转型期。西欧正经历罗马帝国解体以来最激烈而深刻的历史性变革，不同社会、政治和宗教势力处于极为复杂的矛盾冲突之中，以天主教为基础的传统意识形态已经失去昔日的权威，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的合力正改变着历史发展的方向，各种新思想不断涌现，许多传统或者古老的思想被赋予新的意义而“复兴”，成为解构传统思想体系、打击封建制度、推动历史前进的重要思想武器。培根是这个时代的产物，思想十分复杂，文艺复兴时代的新旧思想和各种矛盾大都集中存在于他身上。维克尔指出，“即使在那个充满矛盾的时代，他身上的矛盾也非同寻常”。尽管如此，他在本质上是一个破旧立新的思想革新者，极力推动历史进步。

培根自视甚高，从青年时代起就有一个宏伟计划，要彻底改造和全面复兴人类知识，建立全新的自然哲学和知识体系。这个宏伟蓝图就是他未能完成的多卷巨著《大复兴》。他认为，根据《圣经》，上帝在创造世界之初就赋予了人主宰自然的权力和能力，但亚当因违背上帝禁令在失去乐园之时也失去了对自然的控制。他的雄心就是要通过彻底改造人类知识和重组自然科学来研究自然并重新获得人对自然的掌控。他将信仰和知识、神学和自然科学区分开，认为不能用神学的方法研究自然、社会和人类，而必须创立新的研究方法和建构新的科学体系，开创学术和历史的新纪元。为此，他称自己为新时代的“鸣锣开道者”，爱默生也说他是“科学法则的制定者和深刻而充满活力的思想家”。培根思想敏锐、学识渊博，为开拓新时代，为人类知识的“大复兴”，他的研究不仅涉及大自然各个方面，而且深入到社会、人性、政治、宗教、历史、道德修养、人际关系乃至修房建园等几乎所有领域。他在31岁时就充满自信地宣布：“我已把所有知识都作为我的领域。”但培根最值得称道之处并非他广博的知识，甚至也不是他那些充满睿智的思想和观点，而是他毕生提倡的“新工具”，或者说新方法。

自基督教成为西方世界的权威信仰体系之后，上帝和《圣经》就成为至高无上的真理，经历代神学家阐释的基督教教义和价值体系成

为人们认识社会、自然和人自身的出发点和检验一切“真理”的唯一标准。培根打破偶像，破除教条，旗帜鲜明地反对这种以演绎逻辑为基础的经院哲学式思维，极力提倡一种建立在对客观世界的直接观察之上和以实验为基础的研究方法。这种思维方式和研究方法在当时的欧洲具有革命性意义。更重要的是，培根不仅仅从理论上系统阐释这种新方法，而且在其所有著述中，把它运用于对自然、社会、伦理道德、日常生活等所有方面的研究。在哲学领域之外，培根著作中影响最大的无疑是《散文集》。而这部著作最值得称道之处也许并非里面大量脍炙人口的格言警句，甚至不是其中充满睿智的深入分析，而是对他所提倡的新方法的绝妙运用。

《散文集》是培根生前唯一出过三个版本的著作，他甚至将第三版译成拉丁文，期望它获得更多读者并流芳百世（拉丁文版在1638年出版）。他在《散文集》第三版献词中宣布：“只要世上还有书籍，我确信（这些散文）的拉丁文（此乃所有人之语言）版就不会消失”，足见他对这部作品之重视和充满信心。然而与作者预言相反，并非拉丁文版而是英文版《散文集》广为流传，“在随后三个世纪里影响着英语国家（和欧洲）的文化”。

《散文集》历经三版，其数量、内容、涉及面和所体现的智慧和洞察力都随培根年岁的增长、阅历的丰富和思想的发展而不断增加、拓展和升华。《散文集》三个版本分别出现在他急于涉足官场却累遭挫折、任副总检察长后不断迁升、已历经世事沉浮后赋闲在家这三个他人生中的关键时期。在很大程度上，《散文集》的“成长”记录并表现了作者本人的人生轨迹和思想发展。

1597年版《散文集》虽然只有10篇相对来说比较短小的散文，售价仅为20便士，但立即产生了很大影响，其读者甚至包括当时许多著名人物，如莎士比亚、琼生和邓恩。这个集子随后在1598年、1604年和1606年3次重印，可见很受读者欢迎。1612年版包括初版中9篇（其中第八篇《谈荣誉和名声》未收入）和新增加的29篇，共38篇散文。1625年版在第二版基础上增加19篇新文，并把《谈荣誉和名声》也收入，一共58篇。除了新增文章外，后来的版本还对以前的文章进行了不同程度甚至较大幅度的修改。

为什么将这些文章称为“散文”(essays, 也可译为随笔), 他在为 1612 年版原来写的献词中有所说明。培根说它们是“一些短小随笔(notes), 写下它们并非为好奇, 而是具有深意, 我把它们称为散文。这个名词刚出现, 但这体裁很古老, 因为塞内加写给鲁基里乌斯的书信集, 如果我们留心的话, 正是这种散漫式思考的议论(dispersed meditation), 它们虽然是以书信形式表达”。他说这个名词刚出现, 是指法国的蒙田不久前出版了以“散文集”命名的集子。蒙田的散文和塞内加的书信之间一个主要共同点就是, 它们都是就某一主题, 比如友谊、时间等, 从不同方面用优美文笔表达一些自己的思考或观点。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 培根把自己“随笔”性质的文章称之为“散文”。实际上, 从形式到内容, 他的散文同前面两人的作品大为不同。特别是他在 1597 年出版的 10 篇散文, 与塞内加和蒙田的文章更是相去甚远。

培根与塞内加和蒙田在散文写作上最大的不同在于他突出地使用了一种警句(aphorism)的形式和风格。任何读过培根《散文集》的读者, 都不可能不发现并赞叹其中大量语义隽永、脍炙人口的格言警句。在这方面, 1597 年版最为明显。在很大程度上, 该版中每一篇散文都是由一系列警句式的小段落组成, 它们是关于同一主题的不同方面的真知灼见。但作者基本上没有对这些警句进行阐释或发挥, 更没有用分析或其他方法把它们整合成意义连贯逻辑清楚的统一体。相反, 这些段落还用分段符号分开, 似乎在有意凸显它们之间逻辑上的不连贯。这样, 每一篇散文看起来都像是数量不等的警句的集合体。比如, 培根散文中的名篇《论学习》是该版的开篇之作, 该文包括 8 个警句式段落, 用 7 个分段符号隔开。这些段落后来全被收在经过较大扩展的 1625 年版中, 比如“读书可使人充实, 讨论可使人敏锐”、“读史使人明智, 读诗使人灵透”等, 都成为最广为流传的警句。虽然后来的版本去掉了分段符号, 对前面版本的文章进行了程度不同的修改和充实, 而且也在有些警句之间添加了一定连接性话语和例证, 但这种警句形式和风格大体上得以保持, 并被运用到许多新增篇章之中, 成为培根散文一个特别突出的本质性特点。因此, 要真正理解和欣赏培根的散文, 就必须首先把握他关于格言警句的独特观点和对警

句形式的创造性运用。

在著述中大量使用警句格言自然不是培根首创。据学者们研究，这种情况在文艺复兴时期十分普遍。斯特恩指出，文艺复兴“显然是法则和格言的全盛期”。这种状况其实揭示出文艺复兴的一个深刻悖论：需要权威来颠覆权威。本来，文艺复兴人“复兴”古典文化并非要回到过去，而是将其用作思想武器来颠覆现存秩序，推动历史向前发展。格言警句是历代人们智慧的结晶，很有权威，文艺复兴思想家们大量运用格言警句在很大程度上正是要借助其权威来对付当时的权威思想体系，如培根所说“将其用来服务于现实”。

文艺复兴时期是英格兰历史上流传下最多格言警句的时代，而培根则是为后代留下最多格言警句的思想家。他搜集和创作了大量警句，把它们写在笔记本中，并广泛运用到包括《散文集》在内的所有著作里，而《新工具论》就是直接以警句形式写成。在初版《散文集》之前，他就已经写出一本《法律格言》，并在其“序言”（写于1596年）中初步表达了对警句和警句式写作形式的独特看法：“用一系列独特而不连贯的警句来表达知识，的确能给予人的才智更多腾挪跳跃的空间，使之能更有成效和多方面运用。”培根所用警句主要来源于医学、法律、《圣经》和历代思想家等许多不同传统，它们是各领域千百年来人们智慧的结晶。但培根并不仅仅是继承前人智慧和发扬这一传统，像他那雄心勃勃的《大复兴》一样，他用他所提倡的科学实验方法，对格言警句这一独特形式进行创造性发展和运用。

在谈到格言警句时，培根说，在古代，当人们发现“任何从观察得来的知识有益于生活，他们就会收集起来，用隐晦的格言或寓意式的警句来表达”；而这种“从具体事物中获取的鲜活的知识最易于返回到具体事物”。对于培根，格言警句的真正意义在于它们是人们对自然、社会、人和具体事物细致观察和深入思考的结果，所以它们不是抽象的教条，更非一成不变的“终极真理”，而是人们进一步考察自然和社会的引导和“材料”（data）。我们不能对其盲目崇信，而应该将其“返回到具体事物”，在运用中根据实际情况对它们进行考察、检验和修正。比如在散文《论爱情》中，他在给出“高贵的心灵和伟大的事业均可抵御这种愚蠢的激情”这个警句之后，立即用两

个实例来对其修正，并指出“由此可见，似乎爱情不但能钻进无遮无掩的心扉，而且（偶尔）还会闯入壁垒森严的灵台，如果守卫疏忽的话”。也就是说，“高贵的心灵和伟大的事业”并不一定能抵制爱情。在《论复仇》里，他引述“基督要我们宽恕仇敌的教导”，但随即举出为恺撒报仇等三个历史上著名的例证来证明可以报“公仇”，而且说“报公仇多半会为复仇者带来幸运”。如此运用实例或生活现实来修正广为接受的观念在其他许多散文，如《论真理》、《论善与性善》、《论友谊》、《论复仇》、《论嫉妒》、《论虚荣》等篇章里，也都十分突出，充分表现出他尊重事实的思想和方法。

关于格言警句和警句式写作，培根还有大量精辟见解。他说：“阐释性话语被砍掉、例证的说明被砍掉、连接和顺序话语被砍掉、运用性描述被砍掉，所以警句中所剩全是实实在在的观察结果（observation）”，因此“只有那些思想睿智且有根有据之人”才“敢于撰写警句”。最有意义的是，培根把警句作为写作方式，把许多警句或者警句式段落、权威的引言、历史事件或人物，以及大量含义丰富的各种例证直接并置在一起，“砍掉”它们之间的逻辑联系，在散文中创造出一种与现代主义诗歌多少有点相似的“碎片”风格。爱默生说，培根的作品具有“碎片性”，犹如“没有用灰浆黏合在一起的散沙”。在培根的许多著述中，这些“碎片”由于没有受到逻辑阐释的强力整合而具有一定象征隐喻的特点，如同在诗歌里一样，可以从不同角度解读，含有丰富的多重意义。里特认为，培根的散文与“17世纪诗歌的手法有内在联系”，因此应该像阅读邓恩的玄学派诗歌一样阅读和理解培根的散文。培根不仅是思想深刻的哲学家，他的写作风格，特别是他对警句形式的运用，反映出他诗人般的形象思维，难怪一直有那么多人认为莎士比亚的戏剧是出自他的笔下。

对于警句的性质和警句式写作风格如此阐释也许是培根在写作方面最具独创性的观点，而这些观点对人们阅读和理解其《散文集》极有意义。《散文集》中有一些篇章，比如关于修房建园的那些实践性很强的文章，层次分明，条理清晰，生动具体得令人赞叹。然而，集子中更多的文章却并非如此，它们程度不同地具有作者所说的警句式写作风格。《论真理》是英语散文史上的名篇，它是培根为1625年版